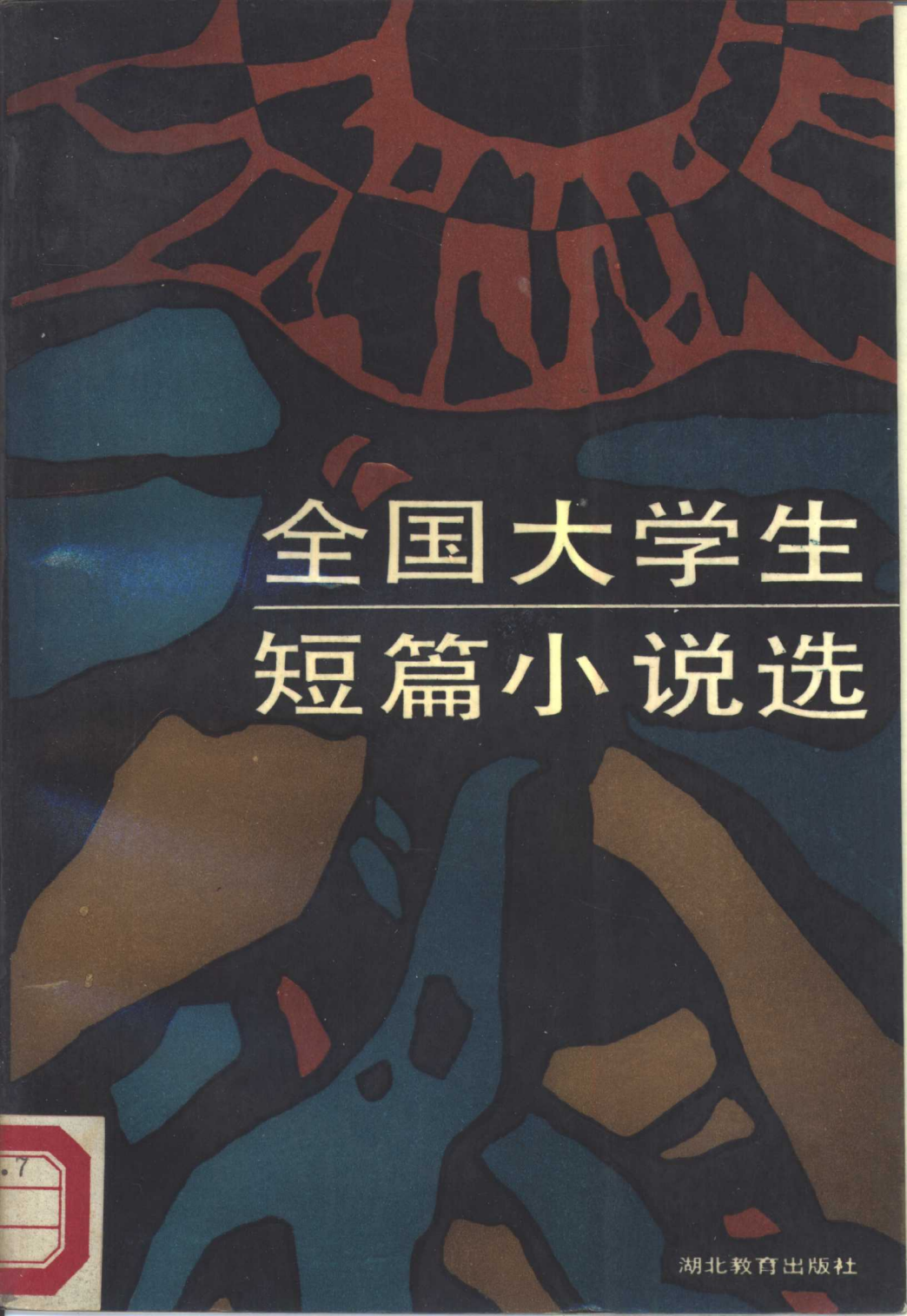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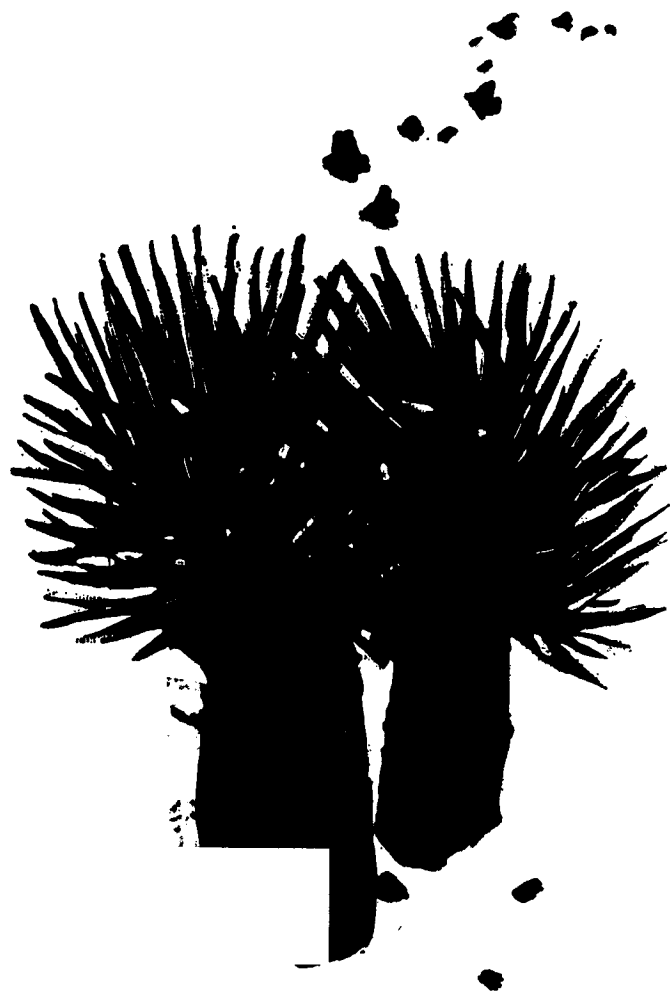
全国大学生 短篇小说选

湖北教育出版社



全国大学生 ● 短篇小说选

南京大学中文系本书编选组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全国大学生短篇小说选
(大学生创作丛书)
南京大学中文系本书编选组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5插图 347,000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 7306·501 定价: (覆膜)3.35元

内 容 题 要

本书是从全国大学生的四百多篇短篇小说中精选而成的。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思新颖、表现手法奇特多样，充分体现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许多作品都是这批有才华的大学生作者的处女作或成名之作。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有编者简洁准确的评介，以帮助青年学生了解这些佳作的写作技巧和认识这些佳作的艺术价值。因此，它既是一本可供读者欣赏和专家研究的艺术品，也是广大文学青年和大、中学生比较理想的写作范文。

论新时期大学生的短篇小说创作

(代序)

裴显生 王继志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各种文学样式中，短篇小说取得的成就是比较高的。而在短篇小说作家的群体中，有一支生力军——大学生作者。这个事实，我们是早就注意到的。因此，当中国写作学会委托我系编选一本新时期《全国大学生短篇小说选》时，我们便欣然同意，并认真投入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

读着这一篇篇各地推荐来的佳作，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为祖国四化培养建设人才的高等学校校园里，潜蓄着多少具有文学创作才能的青年啊！只要我们各校的党、团、学生会组织和老师们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支持，不把大学生在学好本专业功课基础上搞文学创作看成不务正业，那么，在我们的校园里，将会开出比现在更加灿烂、更加光彩夺目的文艺之花。

限于篇幅，这个集子只收入短篇小说三十一篇，微型小说五篇。由于这三十六篇作品是从近四百篇来稿中精选出来的，所以题材、情节的雷同，表现方法的一般化等，已经基本上避免了。又由于这数百篇来稿的作者除西藏、台湾等少数省、市没有以外，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就给我们执行既掌握标准，又照顾地区的广泛性的编选原则提供了方便。当然，由于照

顾全面，入选的作品在内容和技巧上会有些参差，但我们仍然认为：凡入选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是在水平线之上的。由于时间太仓促，征稿启事发得也欠广泛，我们不能说这个选本无“遗珠之恨”，但我们似乎可以说，它并没有以稗充谷之嫌。

在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编选这个选集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充分肯定大学生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认真探讨一下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为此，我们在这里写下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文学是生活的儿子，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个作家只有在生活中真正尝到人生的酸、辣、苦、甜、咸，才能写出有生活味道的作品来。对于大学生作者来说，也不例外。

这个集子中选的是自一九七七年以来入学的各届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短篇创作。从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新时期文学由揭露伤痕到偏重反思再到描绘转机、反映变革、反映四化建设新局面的不断前进的足音。

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我们想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多地发现一些大学生中的新作者，把他们的作品呈献于全国大学生和广大读者面前，因此，对一些已经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学生作者的作品，诸如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陈建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方方的《“大篷车”上》以及王小鹰、陈可雄、陆星儿等人的大学时代的作品，都有意作了回避，没有收入这本选集中。因为这些作品有的已在全

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多数已经收入作者自己的或有关的短篇小说集中，有的还拍成了电影或电视，不仅受到了评论家的注意，而且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批佳作，自然是标志着新时期大学生短篇小说创作的水平。就这些小说的作者来说，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有较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是生活的乳汁哺育了他们，是生活的战鼓催动着他们拿起了笔。

新时期大学生们的创作能与整个文学同步前进，创造出题材广泛、思想深刻而又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作品来，原因很多，我们以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恢复大学高考制度后入校的几届大学生，很大一部分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工矿企业的青年工人。他们刚刚从一个令人诅咒的昏乱的年代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坎坷的生活经历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们虽然进入了高等学府，学着各种各样的专业，但他们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在严肃地思考、议论过去、今天和明天的生活，认真地思考、议论着刚刚读过的文学作品。在思考、议论之余，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起了笔，激动不已地把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表现出来。这样，一篇篇具有一定生活容量和思想深度的大学生创作就奉献于读者面前了。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文学领域是一个真实的领域。文学来源于生活，没有对生活的观察、感受和理解，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任何文学天才也是创作不出好作品来的。

但是，这个理由似乎只能用来说明恢复招生制度以来最初的几届大学生，即七七、七八、七九级的大学生以及他们最初创作的一些作品，对于现在仍然在校的几届大学生又作如何解释呢？他们并没有前几届大学生那样丰富的社会经历，年纪轻，是从高中直接升入大学的，他们的作品不是也有很多收入这本集子吗？诚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象陈建功、韩少功等人那样丰富，

但是，他们毕竟是新时期开始以来入学的大学生，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生活的社会环境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共同处于经过巨大的历史反复后出现的新时期的哲学气氛和心理气氛之中，他们共同的思想特征是对周围世界的发展变化的更多关注；对社会、人生的广泛观察与思考。他们虽然对某些生活缺乏亲身经历，但是他们可以而且愿意从父辈、兄弟姐妹、亲朋的亲身经历中接受信息，获得大量的素材。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大学生活又给予他们浓烈的新鲜感和责任感。这样，他们就能够以自己的新鲜感受和充沛的激情参加到同时代人的文学活动中去，从而创作出反映时代风貌、表现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来。这里，我们不禁联想起当代著名作家王愿坚同志的创作来。他没有经历过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没有参加过长征。红军长征时，他还只有七岁，可他却写出了《党费》、《七根火柴》、《足迹》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英勇斗争和红军长征中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除了作者参加革命斗争和对过去时代的题材作过细心的搜集、整理外，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当时的创作方式、创作活动及创作内容的诱发和影响。何况今天在校的大大学生与他们的创作题材时间差距没有王愿坚与他的创作题材差距那么大。既然一个时代都无法阻断作家的描绘内容，那么学校的围墙又怎么能阻断作者与他所写的社会生活的联系呢？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的大学生作者生活的积累和体验，还不够丰厚，需要有一种积极、热情的态度不断地开拓、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和生活领域，丰富自己的生活矿藏。那种“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议论，实在是有害的。我们要的是直面人生，在生活中勤于观察、勇于剖析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并给以深刻的表现。激烈变革的生活在呼唤着文学，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作者努力感受时代的脉搏，把握时代的精神，在火热

的斗争生活中大胆探索，知难而进。

二

列宁称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高尔基把文学作品看作“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当我们考察新时期大学生短篇小说的成就时，自然要首先考虑它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这个大学生短篇小说集，基本上记下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足音，是和新时期整个文学创作同步前进的。那么，就让我们循着这个足音去看看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吧！

十年浩劫，我们的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我国人民经历了尖锐复杂、艰难曲折的斗争考验。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的党、国家、社会、家庭造成严重的内伤和外伤。从揭露伤痕的大学生短篇创作来看，卢新华的《伤痕》自然是一个代表。在这个集子里，《水泡子》、《郁金香与海棠叶》、《生活在回答我》等几篇，可以说是揭露社会创伤，带有“伤痕”文学特征的作品，但是又对“伤痕”文学在揭示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有很大的突破，能引起读者更深的思考，给人以更多的奋进力量。

蒋濮的《水泡子》，通过对正直善良的农民——水泡子由对权势的俯首听命、盲目崇拜到幡然觉醒、与之决裂，最后又不得不向权势者妥协的一系列思想行为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权力支配社会”的不合理政治对劳动者人格与尊严的蹂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未庄的统治者——赵太爷、假洋鬼子等联合结成的权力大网把个阿Q剥夺得一无所有，最终还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谁会想到历史向前推进了七、八十年，阿Q的子孙们已经尝到了做主人的滋味之后，一场政治风暴竟又把他们刮到了“老祖

宗”的位子上去了。伴随着水泡子的，除象征被驱使、被奴役的一双大头劳保皮鞋和一只马蹄闹钟之外，其余的一切，包括他的诚实、名誉、爱情……全被靠造反夺权上台的大队发书记剥夺了。小说的结尾，是愤然出走的水泡子又回到了小铝厂，为自己也为两个兄弟继续干他的苦役加工头的工作，但是发书记这尊偶像在他的心目中永远崩塌了。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一篇和何士光的《乡场上》参照起来读。那位被权力揉搓得连狗也不如的冯么爹，如果不是幸运地遇到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新转机，怕是一辈子也恢复不了他的人格与尊严。可以想见，水泡子如果遇上了冯么爹那样的机运，他也会挺起腰杆的。

沈泰来的《郁金香与海棠叶》，通过老教授于凇的一对得意门生——阿檬和海伦人生旅途的沧桑变化，揭示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曲折与反复。阿檬与海伦原是一对恋人。在祖国黑夜和黎明交替的时刻，海伦怀着恐惧心理离开故土，远走他邦；阿檬却怀着对真理的追求，留在国内迎接解放。临别时，海伦送给阿檬一支象征着友谊的郁金香花。可谁料到在“交心”运动中，阿檬的虔诚竟换来了一顶“特嫌”的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在“史无前例”时，更是身心受到非人的摧残，仅靠几片象征祖国——母亲的海棠叶维系着生命。等到云开雾散，已获得比较文学博士的海伦回国讲学、观光时，阿檬却连一张办理工作证的登记照都来不及拍，就艰难地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旅程，悄然地倒下了。临死前，他想的仍然是祖国，他最后的唯一心愿就是请老师把一片海棠叶嵌在自己的骨灰盒上。这确实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从这个悲剧中，看到了在承受不公平待遇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看到了中、老两代知识分子不计个人恩怨始终把心贴着祖国的崇高的灵魂。在这样的优秀人物面前，那些制造悲剧的人是何等渺小啊！

何真的《生活，在回答我》，在思想和技巧上似乎不如上面两

篇成熟，但是它较真实地写出了曾经被欺骗、被愚弄的一代青年现实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我们说上述三篇小说揭露了伤痕，但又突破了所谓“伤痕”文学的局限，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已跳出了从个人本位出发抒发自己被欺骗、被愚弄的悲哀与愤慨的圈子，把眼光投向了全社会，在揭露中包含着颂扬，从毁灭中看到了新生，在描绘生活中的灾难时看到了生活对人的灵魂美质的锻造，而这恰恰是对生活本质的符合辩证法的把握。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时期的大学生生活是引人的。当大学生们拿起笔来时，当然不会忘记抒写自己和周围同学的生活、学习、理想和爱情。只不过他们没有忘记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即使是写学生生活，也把笔触伸向整个社会，使作品反映的生活更具有深度和广度。在这个集子中，我们选入了《我们3—333》、《大学生“贺老六”》、《脚印》、《学院里的风》和《荒原上，有一株白杨》。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里，陈垦的《我们3—333》，写了一个男大学生的寝室，写了五名被称为“非正面形象”的大学生的种种表现。同是一个班级的同学，他们之间有的只是经历、性格、思想的差异，而绝无身价的不同，但是我们有些人却以信任不信任为标准人为地把他们分成鲜明的等级。结果，就逼出了这五位不被信任的“难兄难弟”以“不公正去报复不公正”的种种恶作剧。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人，在国家、民族的尊严与荣誉遭到挑战时，个人的自尊与民族的自尊竟是如此统一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显露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正面人物的本色来。在这里，作者给我们所昭示的一个生活哲理就是：当你对那些蒙上灰尘的金子投去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时，同样也应该

意识到,被你当作金子的那些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否则,在中国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屡次发生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演!这个昭示显然已经超出了对大学生活的概括,而是对整个社会提出的一个忠告。

周向潮、骆丹的《大学生“贺老六”》塑造了一个从绍兴乡下来的思想、气质以及生活、爱情上都有点象《祝福》里的贺老六的大学生形象。比较之下,张晋蜀的《脚印》中塑造的王军,更富有时代的光彩。这是一个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埋头苦干、奋发有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面上看来,这个人物有点儿“冷”,实则是外冷内热、冷中透热。他不肯参加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而潜心钻研《资本论》;不去参加“三·二〇”狂欢之夜的游行,却去农贸市场进行实地的调查;一贯独来独往,却又不避嫌疑跟“找不到出路”的女同学谈心;毕业时不去“哲学所”,却要求去山西临汾工作……他的“冷”正表现出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思考和执着追求;他的“热”,则表现在他对祖国怀有一颗炽热的心,表现在他发奋努力的行动之中。如果说“贺老六”沈靖更多的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那末,王军则更鲜明地表现了八十年代青年勤于思考的特点。应该说,这两方面都是对当代大学生本质特征的较为准确的概括。

写大学生生活,不能回避写年轻人的爱情、理想。程宏的《学院里的风》写林珏与何妍楣的恋爱纠葛,不只是嘲讽了浅薄势利的市侩哲学,更主要的是告诉人们:有志者应该从挫折中获得反弹力,努力提高人生硬度,把个人融入到激越的时代进行曲中去。朱幼棣的《荒原上,有一株白杨》,写了两个大学生在列车上邂逅相遇而产生的爱情,热情歌颂了象女主人公余莹那样以苦为乐,以创业为荣,自觉地把事业与爱情统一起来的年轻人,唱出了一支当代青年的爱情、理想之歌。诚然,在大学生中也有一些目光狭隘、贪图安逸、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阿混”式人物,

我们无需回避这一事实，但象余莹那样有理想、有抱负，热爱生活，一心扑在祖国建设事业上的青年，才是主流。他们象荒原上一株挺拔秀丽的白杨，代表着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我们的文学，应该满腔热情地去讴歌这大有希望的年轻一代。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总是与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取同一步调的，既然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已由医治创伤的阶段跨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那么，我们的文学也必然要适应这变化了的新形势，深刻地反映伟大历史变革时期的现实。整个文学创作如此，大学生的创作也该如此。收入这本集子中的《杀猪的喜剧》、《江湖牙医》、《葵涌三女传》、《有那样两座小棚》等一系列作品表明：我们的大学生作者没有把眼光局限在校园里，而是注视着整个生活的变化，敏锐地抓住了国家的政治转机给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的新生机，而且透过经济的变化，看到了新的时代因素如何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

用不着再过多的举例，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大学生的短篇创作，反映生活的面是比较宽的，而且也有相当的深度。作者们以自己的小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的生活风貌，表现了浓烈的时代精神。这些短篇合在一起，组成了一曲新时期社会变革的交响乐。应该说，在当代小说发展史上，是应占有一席之地的。

三

文学对生活的赞美，是通过对人心的赞美来实现的，文学对社会的针砭，也是通过对人的灵魂的鞭挞来实现的。文学的力量在于震撼人心。文学的独特社会职能，就是通过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通过对各种各样人物的心灵塑造，使善良、坚强、美好的灵魂得到张扬，使卑鄙、丑恶、猥琐的灵魂受到鞭挞和改造。收

进这本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小说，就是对社会、人心进行探索，对美好的灵魂进行赞颂，以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的作品。从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作者们不满足于一般地叙述人物的言行，编写动人的故事，而注意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写人的命运和人物的心灵的历程了。这里，我们再谈谈集子中的另几个短篇。

卢玲的《能不忆江南》，通篇写一个女大学生的心理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她因为是“右派分子的女儿”，被迫上山下乡，几经曲折，和一个朴实、勤劳、善良的青年农民结了婚。以后她考上了师范大学，却遭到一些人的讥嘲，认为他们的结合是“麻袋上绣花”。作品通过这位女大学生对自己的身世和对农村丈夫的片断回忆，歌颂了劳动者善良、美好的品德，给真正的爱情作了符合人情的注解，而对被扭曲了的爱情观念作了合乎理性的辨正。

杜万青的《“榔头”郭山林》塑造了一个耿直倔强，心里装着国家，眼里容不得虚假的老农郭山林的形象。小说围绕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后两次送子参军的中心事件，不仅抨击了以权谋私、虚伪奸诈的“大队长”张万川，而且发掘了潜流在中国农民身上的那种精诚报国的民族气节、慷慨凛然的献身精神以及国家主人翁的英雄气概。曹布拉的《篱笆》则通过一条篱笆隔开的两户人家的对比描写，不仅对领导干部中的庸俗势利、以权谋私者进行了谴责，对忧国忧民、急公好义者进行了颂扬，而且对造成尸位素餐者官运亨通的社会根源进行了解剖与透视。而肖元生的《新月弯弯》，对勤劳、善良而在“经济上困难，精神上愚昧”的农村妇女寄以深切的同情，同时，也无情地批判了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呼喊人间应该多一点温暖。

“典型性格的刻画，永远是艺术创造的中心问题。”（茅盾：《关于艺术的技巧》）没有具体实在的人物形象，只有一点

情绪，一声呐喊，那就不成其为小说，即使是微型小说也是如此。在这本小说集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人物的画廊：水泡子、郭六六、郭山林、阿檬、王军……这些人物形象都以生活本身的可感性、活生生的形态出现，没有被神化或净化，没有被漫画化，作者们比较注意从人物的整体和不同侧面来刻画人物，从而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里，我们想特别提一提《斗二闲话》和《第八个是铜像》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尚静波的《斗二闲话》中的主人公那斗二，是一个正直、善良、勤劳又不那么幸运的普通农民，但他与玉叶的婚事纠葛，他那几十年的命运遭际，却无不映现着时代的风风雨雨。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深度和本质真实的典型人物，可惜评论家们还没有充分地去估价他。在斗二的经历中，确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曲折，有的还颇为荒唐可笑：说了一句用荒唐不恭的形式表达朴实的真理的话，他犯了“恶攻”罪，蹲了班房；面对宽大处理，他却出人意料地要求“留下来”，说“在这里吃得饱，比家里强”；那旺小偷了马达，他却甘愿替罪，自认“前科”，再次入狱；劳动改造中，却又因祸得“福”，留场后积了些钱，一向嫌他丑的玉叶竟成了他的妻子……在那个一切都颠倒了年代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倒是完全正常的，不合情理的事却是必然发生的。等到不正常的年代一结束，一切不正常的事物便面临着不得不改变的局。既然斗二与玉叶的“合”并不意味着幸福，那么两人的“离”也绝非悲剧。庄稼人的日子红火起来了，玉叶从过去屈从于“苦命”到现在的自己掌握命运，这是时代的赐予；至于斗二，“离”固然给他带来痛苦，但前景同样是光明的。“眼下政策深得人心，斗二如要发力治家，说不定还会重入洞房，再续姻缘哩。”去北京美容，已意味着一个新斗二的诞生。斗二的个性是鲜明的，命运是独特的，但他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他，确实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苏忠贵的《第八个是铜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改革家李西平的形象。当然，这个艺术形象，还不够丰满，但他确实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体现出我们这个伟大历史变革时期的时代精神。如何塑造好社会主义改革家的形象，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课题，需要我们的作家有“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揭示四化建设和社会改革中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塑造出更多有胆有识、有才干的改革家的艺术典型来。

四

一提起大学生的创作，有的会摇头。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些标新立异、赶时髦、现代派、意识流、存在主义、黑色幽默的大杂烩。其实不然。我们在阅读了这近四百篇来稿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时期大学生的短篇小说创作，在艺术表现上虽有许多突破和尝试，但更多的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吸取了现代派的一些表现技巧，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依然占着主导地位。如若不信，可以这个集子中的作品为证。

《江湖牙医》从生活出发，恪守人物性格描写的完整性、一致性的原则，通过一系列富有特征的生活事件和心理、行为描写，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江湖牙医郭六六的形象。它不光在内容上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带有以往的所谓“写中间人物”作品的特征，在表现方法上也可以看出作者与赵树理、马烽、西戎等山西老作家的师承关系，情节生动、完整，语言幽默、诙谐、口语化。开头一段关于郭六六外号、手艺和所谓“帽子”的介绍，使人自然联想到《小二黑结婚》开头对二诸葛、三仙姑的身世交代；对郭六六行医中一件事、一件事有头有尾的叙述、描写，也可以看出“山药蛋”派作家作品的特征。

《杀猪的喜剧》和《“榔头”郭山林》，一是写大西南，

一是写大西北，但同样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显示出鲜明的地方色彩。它们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情节发展跌宕起伏，故事的结局出人意外。总的说来，它们都从“乡土文学”中吸取了营养。细加品味还可以发现，《杀猪的喜剧》在技法上仿佛从沈从文的作品中获得了更多的借鉴，比如作者在杀猪匠王六儿到满爹家后动手捉猪前插入一段关于王六儿的举止神情、穿著打扮的描写，满爹心理活动的刻画以及两人对话的描写，都使人自然地联想到沈从文作品中某些人物的塑造。它们看起来都有点游离于中心情节之外，而事实上却又都对故事的主干作了烘托、陪衬和铺垫，使所写的人物和生活更具有力度和厚度。《“榔头”郭山林》则似乎更多地从北方“乡土文学”作家作品中受到启迪和影响。

《郁金香与海棠叶》的人物塑造，不仅采用了对立对比的方式，而且在叙述中不断变换观察点。作品的三个主要人物全用第一人称叙写，分别让他们站在“我”的立场上观察别人的行为、剖析自己的心灵，交叉对照，相互补充。这就突破了传统的或用第一人称、或用第三人称一贯到底的写法，使这篇表现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性格、气质、理想的作品，能在短小的篇幅中收到深刻、隽永、感人的艺术效果。

《我们3—333》在短篇小说中灵活运用长篇和剧本的结构方法，前有“楔子”交代背景，后有“尾声”交代结局。正文第一段则给全部人物各立了一个小传，似剧本的人物表，又似长篇小说人物出场的注脚。这样写，避免了在主要事件的叙写过程中回顾和交代人物身世和性格特征的弱点，使作品的结构更加紧凑，笔墨更加减省，行为描写更加鲜明突出，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唐冬弟的《落日印象》描绘的是当代青年对生活、事业、理想、爱情的执着追求，却采用了某些音乐的象征手法。通篇读来